

# 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与他的父亲何绍春

苗体君, 窦春芳

(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湛江, 524025)

摘要:何叔衡是当时“一大”13名代表中的年长者,其个性最具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来自于他的父亲何绍春的言传身教。父亲何绍春以个人为榜样,教导何叔衡要对自己的家庭负责,这样才能对自己的国家、民族负责;从小以生活发生的事情为范例,教导何叔衡做事要像牛一样踏实,这样才能不会挨饿;临终的遗嘱教导何叔衡对待世间的事一概要公,不要有私心。

关键词: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何绍春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3-0333-04

何叔衡是“一大”13名代表中的年长者,13名代表中30岁以下的占10人,他们多数在20岁左右,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刘仁静当时只有19岁。其余三人的年龄是:李达31岁,董必武35岁,何叔衡45岁。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42岁,李大钊32岁。可见何叔衡的确是年龄最大的人。“一大”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只有毛泽东、何叔衡两名党员,他与28岁的毛泽东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熟知何叔衡的著名作家萧三回忆记到:何叔衡“宽肩膀、矮矮身材、一口黑胡子,<sup>[1](100)</sup>而且还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了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sup>[2](128)</sup>过去最流行的说法是,何叔衡18岁考中秀才,经何叔衡的两个侄媳妇证实,何叔衡考中秀才是在“即1902年(清光绪28年)”<sup>[3]</sup>。当时何叔衡26岁。而在“一大”13名代表中,除何叔衡外,还有董必武(1903年,17岁考中秀才)是光绪年间的秀才,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也是一位秀才(1896年,17岁考中秀才)。

何叔衡的个性最具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来自于他的父亲何绍春的言传身教。

## 一、父亲教何叔衡要“像牛一样地做事”<sup>[4](2)</sup>

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1876年5月27日,

这天正是中国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何叔衡就在这一天出生在湖南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中,其父何绍春是位勤劳朴实的农民,除在家种地外,每年利用农闲时节到洞庭湖沿岸打工,何叔衡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按宁乡农村流传的一种迷信的说法:“男子要午(五)又得五,逢五就是福。”就是说生辰逢五是最吉祥、最幸运的事,而何叔衡生在五月初五,又在兄弟中排行第五,凭此被亲友认为将来一定有出息,他的父亲也就信以为真,于是节衣缩食省出钱来只供他一人读书。

何叔衡从7岁开始就学着看牛、砍柴、割草、干家务活,家中孩子多,粮食少,特别是逢到青黄不接时,父亲就要在饭量上对孩子进行限制,因为何叔衡年纪小,每餐父亲只给他一碗饭,何叔衡常常感到十分饥饿。一天,何叔衡放牛回来的早,端起碗来几口就把碗里的饭吃光了,但他仍然感到十分的饿,他看着刚刚端起碗的姐姐,想起了吃草的牛,说:“吃饭要是像牛吃草那样能放肆吃饱就好了。”站在一边的父亲听到后说:“你长大了像牛一样地做事,一定会吃得饱的。”7岁的何叔衡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这句话,直到他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止,他始终“像牛一样地做事”。

1913年,毛泽东与何叔衡同时考进入公立湖南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四师并入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在刚刚入四师就认识了年纪最大的同学何叔衡,当时毛泽东20岁,而何叔衡已是37岁的中年人了。

半年后,何叔衡提前从“一师”毕业,到长沙市内的中学任教,还担任省通俗教育馆馆长。毛泽东则在“一师”继续读书,前后共读了5年,直到1918年才毕业。1918年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何成为学会中年龄最大的成员,二人还建立了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二人之间配合的十分好,当时在会友中流传一句话:“毛润之所谋,何胡子(叔衡)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萧三说过:“何叔衡同志被捕牺牲距今已经46年了。但是,他那老成持重,实干重于严辞的形象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矍铄老翁何叔衡,建党初期立殊勋。作事不辞牛马重,感情一堆烈火腾。”<sup>[5]</sup>毛泽东也常常说:“何胡子是头牛。”<sup>[6]</sup>

## 二、何绍春在婚姻方面对何叔衡的影响

何叔衡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在家排行老五,就在何叔衡5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的家境在附近几个村子还算是“小康”,但他的父亲却一直没有再娶,辛辛苦苦拉扯着6个孩子,父亲何绍春在婚姻方面对何叔衡影响较大。

1898年,22岁的何叔衡与袁少娥结为夫妻,袁少娥比何大三岁,没有读过书,虽是个文盲,但通情达理,勤劳俭朴,二人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但婚后,夫妻感情笃厚,他们俩共同生的两个男孩不幸夭折,只留下两个女儿,1908年袁少娥又生一个女孩,亲朋友人怕何叔衡绝后,联合起来劝何纳“二房”,这在当时的社会是十分正常的事,但何叔衡坚决不答应,并说女孩也一样是传代人,并以实际行动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伦礼发起挑战,他给大女儿取名实懿,二女儿取名实山,三女儿取名实嗣,“实山”表明女儿也可以是父母老年生活的靠山,“实嗣”二字则表明女儿就是何家的实际的继承人,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妻子的一片深情。

何叔衡本来家道“小康”,当时他又有很高的社会威望,是个让人尊敬的读书人,而且还考中了秀才,纳妾对于何叔衡真是易如反掌的事,但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后来二女儿、三女儿在何叔衡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为防止父女在外发生不测,他把大女儿留在家中照顾妻子的生活,他有一首诗中写到“此身合是忘家客”<sup>[7]</sup><sup>[140]</sup>,这也表达了他对于妻子的一片深情及浓

浓的爱意,难怪毛泽东称赞他“何胡子是一堆感情”<sup>[8]</sup>。虽然没有男孩,何叔衡一直没有嫌弃过妻子,没有买小纳妾。在革命生涯中,他常惦记着家中艰辛劳动的贤妻。在信中他这样称慕着自己的妻子:“您如果活到六十岁,我或者与您有见面之日。但您的一生,是捡柴、栽菜、喂猪的一生,不去求人的一生。”<sup>[4]</sup><sup>[29]</sup>同时,在何叔衡心里,妻子并不是一个没文化的劳动妇女,而是一个贴心人。在革命最艰苦的日子里,他对妻子表示说:“我是要永远地对得起我的骨肉和您啊!我要问您,假使我遭到危险,您是求死呢?还是求生?请答复我。”<sup>[4]</sup><sup>[29]</sup>伉俪情深,相濡以沫,令人感动。

袁少娥始终支持丈夫及女儿的革命工作,在湖南老家掌管家务,侍奉家翁,一生含辛茹苦,却毫无怨言。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当局悬赏捉拿何氏父女,并标价“抓到何叔衡者,奖赏3000大洋”,何叔衡父女被迫逃离,当一批批叛徒为赏金去谁家探听消息时,他们个个被袁氏骂出大门。后来为了躲避敌人的迫害,袁氏与大女儿一起躲进了深山老林里,由于过度惊吓大女儿不幸去世,袁少娥悲痛欲绝,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真是祸不单行,不久,又传来二女婿被敌人残杀的噩耗。随后她与何叔衡及两个女儿中断联系长达21年之久,她天天盼望丈夫及女儿回家,盼到牙齿掉了、头发白了,连眼泪都流干了。在父亲的干涉下,何叔衡把自己的九侄新九过继为子。

1928年6月,何叔衡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已52岁高龄的何叔衡要克服语言关,为了记熟一个单词,他要读上百遍甚至上千遍,被大家誉为“学习上永不疲倦的人”<sup>[4]</sup><sup>[29]</sup>。何叔衡仍然抽出时间给两个哥哥玉书和玉明,及养子新九写信,询问湖南老家的情况。

1950年春天何叔衡的两个女儿回家看母亲,直到这时袁少娥才知道,她朝思暮想的丈夫何叔衡早在1935年就去世了。1957年春天,袁少娥病重,两个女儿回家伺候母亲,母女相守一个月后,一天,袁氏把女儿喊道床前,她知道留给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便向女儿交待后事说:你们俩是公家的人,已请假一个多月了,也不能老为我呆在家里,这样会耽误工作的,赶快回去工作吧!我这一生活得好孤单啊!与你的父亲在一块的日子少的可以数出来,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死了能与你们的父亲合葬……。面对母亲的最后要求,姐妹俩不知如何回答,她们的父亲何叔衡牺牲后,尸骨至今也没有找到,哪里去建坟合葬

哪！不久，袁氏去世，死后依然是孤孤单单的。

### 三、何绍春的遗嘱对何叔衡的影响

父亲何绍春对何叔衡的影响是最大的，他勤俭劳作一生，“是一个位非常正直而又深谙世情的农民，”而且在乡里乐善好施，“有几个穷苦孩子，偷偷地挖何家的芋头，何氏父子不但没有斥责他们，反而担心他们逃跑时摔伤，并主动送给他们芋头吃。”<sup>[17](5)</sup>1926年8月，何绍春在临终前给6个子女留下了这样的遗嘱：“余年八十零，难道还贪生吗？你们娘早死，我教养你们未争得一个什么局面，只望你们兄弟合好合力将债还清。一概要公，世间只有私心坏，事情公则大家安。叔衡抚九孙为嗣莫撒手。我死了不做道场，不烧纸钱冥屋，不劳动亲朋，只行几堂神，装殓不用一根丝，葬于就近就是。切记切记！”<sup>[6]</sup>

父亲何绍春乐于助人的品德对何叔衡影响较大，小时候，遇到来家逃荒要饭的穷人，何叔衡宁愿自己不吃，也要把碗里的饭倒给他们，遇到衣衫破烂的穷人时，何叔衡就会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他们。在做私塾老师时，何叔衡常常帮助穷苦人家的孩子，1980年5月4日，当年何叔衡教过的学生刘华陔回忆说：“他教私塾收费比别人低。”<sup>[4](3)</sup>何叔衡的私塾学堂开学后不久，有一位十多岁的男孩手执割草刀天天站在窗外听课，何就主动走过去询问，才知道这个男孩姓李，因交不起学费就抽割草的闲余时间来窗外听课，何叔衡被这个男孩的行为所打动，就让男孩进教室免费听课。

父亲何绍春“一概要公”“世间只有私心最坏”的朴素的思想，成了何叔衡做人的“座右铭”<sup>[6]</sup>。1931年何叔衡化装成富商大贾，经香港、广东、闽西到达中央苏区的中心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检查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的职务，他的住处与毛泽东的住处仅仅相隔30米远。何叔衡工作时，身上随时背着三件宝（布袋子、手电筒和记事簿）。布袋子是由他自己设计请人缝制的，袋子中分成几个小袋子叫“袋中袋”，每个小袋子都有特定的用场。他的视力不好，第二件宝的手电筒随着他起早摸黑，走村串户。他的记事簿上无所不记，他常常对人说：

“人老了，脑子不管用，记在本子上忘不了。”<sup>[4](3)</sup>到了瑞金时，他的布袋子已满了，人证物证齐全，检察工作、司法工作、内务工作、干部教育情况，什么都有，东西虽多但条理清楚，杂而不乱。

他白天和群众在田间地头边干边谈，晚上召集部分干部群众座谈，没几天工夫就掌握了很多材料。通过汇总整理材料，何叔衡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县、区政府，单靠行政命令去解决问题，有的甚至吞没公款，贪污腐化。何叔衡认为，这些问题如不及时克服，将直接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于是，他随即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项英等领导作了汇报。

当时在中央根据地，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五人年龄较大，被人尊称为“五老”，后来何叔衡因反对极“左”的肃反政策，被诬为右倾并撤销了全部职务。但凭他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在他受错误打击、蒙受委屈的时候，能够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不改变对真理的信仰。

那是在1933年前后，先是“左”倾领导者通过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和1932年8月召开的宁都会议，错误地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同时王明等人为了打击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和地方组织中的威信，错误地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何老被作为“罗明路线”的“另一种倾向”而被错整。他们整何老的主要理由是说他在分管中央革命根据地监察、司法等项工作中有严重的右倾错误，而实际情况是何老在掌管司法大权时恰恰是采取审慎而又稳妥的工作方针，认为不该杀的坚决不能杀，该杀的也要证据确凿才能杀，不能滥杀。如，1932年5月26日，何叔衡审批瑞金县上报的一个叫朱多伸的案件就是采取的慎重方针。朱当时犯有一般刑事罪，基层法院决定判他死刑。何老复审时，认为并非反革命罪，且朱组织过游击队，参加革命，又年已72岁，因此由死刑改“监禁二年”<sup>[4](33)</sup>。这种审慎的作风和态度本来是司法人员应有的职业道德，但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者却反诬何叔衡：“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苏维埃法律的阶级异己分子，或者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司法神圣’的书呆子或俘虏，才会把苏维埃活动用来替反革命辩护或减轻罪行”，并且从1933年6、7月开始对他进行完全错误的打击和批判，还在当年年底还撤掉了何叔衡担

任的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中央检察部长和中央苏维埃临时法庭主席等重要职务。对此,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谢觉哉十分不满,曾对毛泽东说:“中央为什么要整何老头,何老头有么子错?”<sup>[7](191)</sup>但何叔衡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同时坚持从大局出发,从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忍辱负重,服从分配,努力做好组织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哪怕是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

1934年秋红军长征开始,何叔衡被留在了中央苏区,在当地帮助乡政府做动员工作。对于留下何老的决定,四老和苏区的许多同志是在预料之中的,这也是当时王明“左”倾错误打击何老的必然结果。

何叔衡以“一概要公”“世间只有私心坏”为革命事业的座右铭,1935年2月,何叔衡在福建上杭牺牲,“实践了他生前说的‘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sup>[6]</sup>

#### 参考文献:

- [1] 萧三.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 [2] 张国焘. 我的回忆(上)[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4.
- [3] 王兴刚, 方大铭. 何叔衡传略[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1981, (3): 29-38.
- [4]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卷)[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 [5] 萧三. 不能忘却的怀念——忆叔衡同志[N]. 1981-02-25(1).
- [6] 何实山, 何实嗣. 从“穷秀才”到“一大”代表[J]. 新湘评论, 1981, (7).
- [7] 杨青. 何叔衡[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 [8] 谢觉哉. 忆叔衡同志[N]. 解放日报, 1942-05-08(1).

## HE Shu-heng and his father

MIAO Ti-jun, DOU Chun-fang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gjiang 524025, China)

Abstract: HE Shu-heng, one of the few delegate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revolution. The author analyses how he was influenced by HE Shaō-chun, his father.

Key words: delegate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HE Shaō-chun

[编辑:颜关明]